

阿以和平进程

末世论和全球社会政治冲突

——以巴以冲突为例

汪舒明

摘 要: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末世论成了全球社会政治冲突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因,它不仅导致了許多国家内在的社会政治断裂,也加剧了当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矛盾和冲突。巴以冲突就是一个末世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典型个案。末世论是以色列的信仰者集团、美国的基督教右翼积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推进定居点运动,阻扰和平进程的重要动因。这两者的进攻性行动破坏了伊斯兰世界的认同,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尊严和拯救前景,从而引起哈马斯、真主党等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带有末世情结的伊斯兰群体以“圣战”为主要形式的抗争。

关键词: 宗教原教旨主义;末世论;社会政治冲突;巴以冲突;中东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 汪舒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1-0075-07

中图分类号: B97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后期,世界进入了一个“非世俗化”的后启蒙时代,启蒙主义受到了许多质疑和反思,各种宗教重新出现了复兴和扩展的潮流。在此潮流中,宗教原教旨主义乘势兴起,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严重冲击了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宗教对全球社会政治冲突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末世论就是引发全球政治冲突和暴力的一种动力。所谓“文明的冲突”或者“诸神的冲突”,经常表现为不同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所信奉的末世论所激起的冲突。本文以巴以冲突为个案,分析末世论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以冀抛砖引玉,加深宗教介入国际—国内政治的具体途径和方式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文将论述的视角限定为末世论与社会政治冲突的关系,但笔者并不否认,社会政治冲突成因极其复杂,往往教俗动因杂糅,而且宗教动因本身也呈现出多样性。

一、末世论对社会政治冲突的影响

末世论是关于世界最后结局和人类终极命运的信仰和教义。各大宗教的末世论都认为,在人类历史的终结时刻或末日,神或者神意的代表者(如弥赛亚、马赫迪等)终将显现世间实行神圣干预,并对人类施行审判,现世中的善人将得拯救、进天堂,而恶人将受惩罚、下地狱或彻底毁灭,然后世间出现符合神意、神法的完全和平、公义的理想社会,人神重新和好,某种形式的千年王国来临。这样的表述在许多宗教,尤其三大一神教的教义和典籍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在

《旧约》中，末世论是先知书的主题之一，几乎占据《旧约》的1/3；《新约》则以《启示录》对这一主题进行完整、形象的描绘；《古兰经》也包含了大量相关内容。

末世论描绘的神圣拯救和终极审判有着惩恶扬善的价值追求，可以鼓舞人们向善的心灵，加添他们从善的力量，使他们在苦难中内心仍然有平安和盼望。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也符合人类寻求超越的内在动力，有时成为社会道德净化的动力。从这些方面来看，末世论有其推动社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积极意义。^①如果末世论只是限制在心灵和信仰的范围，只是信徒们内心向善的求索，那么它就以一种道德教化的力量发挥规整社会的作用；或如果人并不清楚或并未参悟末日来临的时刻，仍然相信神圣拯救将会在人类毫无知觉的的未知时刻来临，那么人们就会耐心地等待下去。但是，一旦末世论从宗教信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人们自以为知晓了神圣拯救到来的具体时刻，那么，末世论引发的政治行动主义就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的分裂和对立，甚至带来政治冲突和暴力。具体而言，末世论助推冲突和暴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教旨主义的末世论秉持善恶两元论，有时缺乏宽容。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将那些不符合“神意”的事物妖魔化，并以脱离接触独善其身，或以某种方式予以毁灭和清洗来纯洁社会。这种高举善的大旗对恶开战的末世论在雅各宾派专政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1]238-239}在当代，几乎所有宗教原教旨主义都将建基于启蒙主义之上的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看作恶的根源而加以否定和拒斥。现代西方文明的扩展引发了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这成了许多国家内部分裂和冲突以及全球范围内激进伊斯兰反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动因。

第二，末世来临往往以善恶大决战和种种异象为前奏，冲突、毁灭、灾难就成了神圣拯救进程的必经之路。现代社会珍爱人的生命权，但出于神意投身终极战斗以消除神圣拯救道路上的障碍，包括在物理上消灭“恶魔”，不仅正当，而且还成了一种神圣使命。一位著名学者在论及带有末世情结的恐怖分子滥杀无辜时论述道：“一旦某种宏宇或超世的目的加入本已失序的恐怖分子的意识，毁灭的限制就被有效消除了。”^{[2]59}

第三，一旦某些特定群体、地点和历史陈迹的命运与末世拯救进程或拯救权利相关联，就往往成为加剧不同群体间社会政治对立和冲突的诱因，并变得难以妥协，如犹太教所说的神圣拯救进程是以犹太人重聚以色列地、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一带重建圣殿为迹象。在《圣经·启示录》中，犹太人重聚以色列并建国也是基督教所说的“时日将至”的迹象，而且犹太人在耶稣复临重建千年王国的拯救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耶路撒冷也是耶稣复临施行神圣拯救的地方。而在伊斯兰教的末世论中，犹太人对伊斯兰的敌意也受到强调，犹太人被描绘成谋害先知的恶的化身（*Dajjāl*），其角色相当于基督教中的“敌基督”。在末日，犹太人还将作为承受地狱之火的穆斯林的赎金。^[3]

第四，宗教极端分子出于推进末世进程的冲动，可能人为制造或加剧政治纷争和冲突。末世论与社会政治冲突，包括国际冲突的关联情况视宗教群体对末世来临时间和对待末世来临方式（行动主义）的认知而呈现出很大差异（参见图一）：

1. 当宗教群体认为末日是未知的、未来遥远的进程，或者在末世进程中人不应主动参与和影响末世进程，那么，他们就倾向于通过虔敬修行或社会事工（行善）来静待遥远末日。如当今西方的主流—自由派基督教群体就属于前一种，钻进地洞等待末日降临的俄罗斯邪教教徒属于后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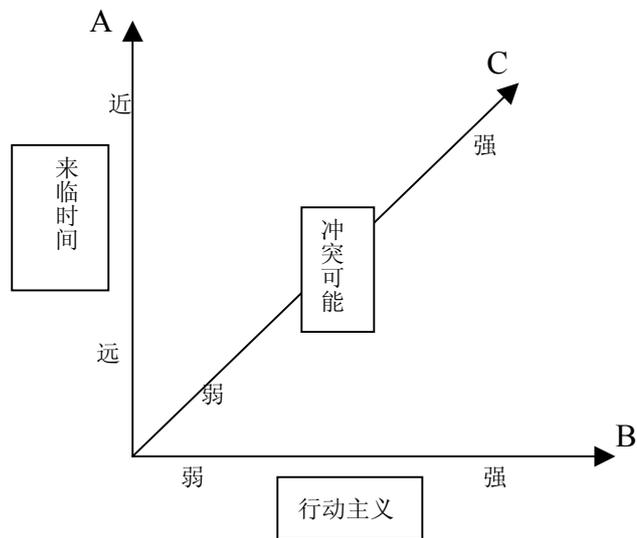
2. 一旦某些群体确信或宣称神圣拯救已经临近，而且这一进程需要虔信者主动推进以改变社

^① 关于现代基督教末世论更新和创造的积极意义，可参见安希孟：《万物得到改造而不是毁灭——基督教末世论的含义》，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希望的末世论——现代基督教末世论述评》，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现代基督教末世论评析》，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会政治状态，那么，这些群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政治行动主义以改造甚至挑战社会政治现状，有时引起国内外社会政治紧张。这些群体为推进神圣拯救进程而作的“和平”行动也经常被其他群体视为对其认同和利益的威胁。有些群体及其成员在和平途径难以满足其愿望的情况下直接诉诸暴力，往往导致冲突进一步暴力化。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马赫迪主义”就对近代北非的马赫迪起义和当今伊朗宗教保守派在国内外的强硬立场很有影响，下文论及的信仰者集团在巴勒斯坦扩建定居点的活动、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强烈支持以色列右翼的扩张以及在美国国内推进保守的社会政治议程等都反映出这种情况。

3. 更危险的是那种将末日来临时刻确定为某个临近的具体时日，而且认为虔信者应该主动捍卫或推进神圣拯救进程。一旦他们所期待的拯救进程出现了危机和挫折，那就很可能刺激他们铤而走险，制造事端推进末日来临和拯救进程（Push the end）。典型的个案有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①刺杀拉宾事件以及美国的基督教极端分子1993年在俄克拉荷马制造的大爆炸。这种情况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群体更加明显，并主要导致国内社会政治冲突。

图一：末世论与社会政治冲突关系



就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而言，情况2中所描述的末世论显然是20世纪末期以来伊斯兰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冲突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宗教文化因素。巴以冲突尤其可以成为观察这种因素对国际冲突影响的一个重要个案。

二、末世论对巴以冲突的影响

巴以冲突属于典型的民族—宗教复合型冲突。尽管宗教动因在巴以冲突中久已有之，但 20 世纪末以前，置身于冲突前沿的主要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冲突各方的诉求也主要是世俗的民族权利。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巴以各自社会中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冲突的主要动力和性质发生变化，宗教因素成了冲突中的关键因素，末世论成了一种重要动因，而民族主义势力渐渐走上了妥协之路，巴以冲突由民族—宗教冲突阶段进入了宗教—民族冲突的新阶段。在卷入冲突的

^① 1995 年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刺杀者。

三大宗教原教旨主义群体中，以色列的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美国的基督教右翼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构成了巴以冲突中最难妥协的力量。这三者都是作为对并不成功的世俗意识形态（以色列的世俗锡安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或泛滥成灾的自由主义路线的替代或反冲而兴起，而且，它们积极介入政治都深受中东事态发展所引发的末世情结的刺激。信仰者集团和基督教右翼的兴起要早于哈马斯，也更早采取了进攻性的姿态。

通常认为，“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的信仰构成了基督教徒和犹太民族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另一些有着同样信仰的力量仍愿耐心等待弥塞亚来临而没有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主义（如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信仰者集团和基督教右翼与各自宗教内部的其他派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从正统的涵义上坚持这些由来已久的信条，并将这些信条与某种推动神圣拯救到来的末世期待结合了起来。

信仰者集团奉行库克父子的宗教锡安主义，即“库克主义”。老库克^①确信犹太民族正处于一个神圣拯救进程业已开始的阶段，弥赛亚时代正在到来。而世俗锡安主义及其进展正是这一进程的迹象，乃是出于神圣源泉的激励。他坚信犹太民族的特殊使命论，反对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提法。他还坚信“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地是完全合一的。”而“以色列地”包含所有圣约（Covenant）神授的历史性的领土（“被占领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更是这历史性领土的中心地带。因此，向“以色列地”定居就成为推进拯救进程的神圣行为。他还提出，重获救赎而产生的新犹太国的理想形态应是一个依据犹太教法（Halakhah，哈拉卡）治理，人人信奉《托拉》的国度。1967年“六五战争”结束后，其子小库克拉比（Zvi Yehudah Kook，1891~1982年）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要求犹太人从宗教义务出发，回归以色列地；主张使以色列新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化”以推动弥塞亚拯救。关于被占领土，信仰者集团就主张“以色列历史性的领土现在必须归于犹太民族之手，这不仅要通过军事行动，也包括定居和政治行动，即行使以色列主权”^{[4]38}。

出于《圣经》文本主义和中心主义，基督教右翼对于《旧约》中关于犹太民族的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新约》中关于神并未丢弃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将要得救以及犹太民族在千年王国到来中起关键作用并将重聚圣城耶路撒冷等教义深信不疑。他们坚信基督教世界由来已久的“千禧年主义”^②的“神定时代论”^③。他们坚信，犹太民族在神的千禧年计划中扮演关键甚至核心角色：在耶稣从圣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复临并管辖全世界之前，144,000名以色列人将受印成为神的第一子民，将回归圣城锡安并成为耶稣治理万民的右膀，神对人类终极审判的主要依据就是人类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和作为。他们往往透过神定时代论的棱镜来解读中东事务和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际。他们深信，犹太民族乃是神的“受难的仆人”，希特勒正是神定时代论中残害犹太人的“敌基督”。犹太民族的受难乃是出于神的计划，乃是人类历史进入第六个时期，即“大混乱”时期的迹象。而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则是拯救进程的重要部分，不仅合法，而且神圣。他们将巴勒斯坦犹太社

① 即 Abraham Isaac Kook（1865~1935年），曾任以色列首任阿兹肯那齐拉比，为宗教锡安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犹太宗教民族主义的精神领袖。

② 千禧年主义预言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复临，在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中战胜“敌基督”（antichrist），然后在世间建立并直接治理基督王国一千年，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终的审判。

③ 神定时代论是一种直接预言千禧年何时来临的末世论。19世纪后期的美国神定时代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程乃是神的伟大计划的展开：神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成前后延续的七个时代；他们生活在第六个时代——即教会的时代——的末期；第六个时代结束到第七个时代之间是七年的战争与灾难，即“大灾难”时期。正是在这个短暂大灾难阶段，犹太人将“不信地”（in unbelief）回归应许之地并建立起国家，并有144,000人受印接受基督为拯救者；这个国家将受敌基督的统治，犹太人将遭遇无尽的苦难，只有1/3的人得以幸存。此后，就进入了第七个时代，即千禧年。

团的勃勃生机、犹太移民的回归、以色列的诞生以及此后在战争中的胜利都看作“时日将至”的迹象，归于“施大能的神手”。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就是“千禧年来临前善恶大决战的导火线”，乃是“上帝的时钟”^{[5]250}。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旋风般的胜利、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统一在基督教世界引起了末世狂热。“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以来，也许没有任何政治、军事事件象这场短暂的战争那样为预言的启动提供了如此多的动力。”^{[6]16}

哈马斯所属的逊尼派并没有像什叶派马赫迪主义那样完整的末世论。^①当今逊尼派穆斯林的社会政治行动主义或许更多出于现代化在穆斯林世界的推进所带来的认同困境和西方扩张损害民族权利、尊严以及拯救前景考虑。哈马斯的末世论主要体现在1988年制定的《哈马斯宪章》中，《宪章》提出为真主献身，以“圣战”抗击西方和以色列，实践真主和先知的预言，拯救和复兴伊斯兰教，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实行“沙里亚法”的纯正的伊斯兰国家“瓦格夫”(Waqf)等原教旨主义的社会政治主张。其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对阿以和谈的反对也明显包含着末世论因素，如第7条，哈马斯将反以“圣战”作为“时日到来”前穆斯林必需的行动，是对神意的忠诚，“……先知说，直到穆斯林起来击打犹太人（并杀死他们），直到犹太人躲在石头和树木后面，而这些石头和树木呼告‘哦，穆斯林，有个犹太人躲在我后面，快来，杀死他。’时日才会到来”^[7]。事实上，这一表述直接转引自伊斯兰教典籍中的末世论文本。另外，将末世论与“圣战”联系起来，强调以“圣战”作为推进神圣拯救的途径，这是哈马斯等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特色。当然，在介入阿以冲突的各群体中，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或许更能体现出末世论的影响，但它超越了巴以冲突这个个案，此不赘述。

这三个群体共有的反现代世俗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加剧了各自社会政治的对立和冲突，使得各自都难以产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出和平共处所必需的“痛苦的让步”。任何一方阵营中理性、务实的力量都受到带有强烈末世情结的“理想主义者”的牵制，而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则往往联动呼应。这三者都信奉严格的一神教，都宣称承担着神圣的宗教使命，积极寻求和推动“神圣拯救”；都强调巴勒斯坦、尤其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及其不可让与、不可妥协性。

这三者以不同方式加剧了巴以冲突，制约了和平进程。如前所述，哈马斯加剧冲突的独特方式是将末世拯救与捍卫伊斯兰的“瓦格夫”以及开展对以“圣战”联系起来。而信仰者集团和基督教右翼加剧冲突的主要行动方式则为支持和推进定居点运动。

出于实现被占领土“以色列化”以推进神圣拯救的动因，信仰者集团仿效锡安主义运动早期的先驱者，在被占领土狂热推动定居运动，制造新的既成事实。1967年~2000年年底，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共建成定居点180个，其中西岸的“注册定居点”为139个，“非法定居点”为25个，加沙地区为16个，定居者总数达203,067人。^{[8]351-352}信仰者集团并不拥有所有定居点，但它是扩建定居点运动中最顽固、最强大的势力，众多深入巴勒斯坦人居住区的小型“非法定居点”主要是他们所建。这些定居点蚕食了大片被占领土，建成了众多住房、工厂和工事，修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占用了很大比例的被占领土自然资源（如水、土地等），还将巴勒斯坦切割得面目全非。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强大的定居者利益集团本身也成了反对撤离定居点、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强大政治势力。他们经常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暴力抗警，唆使士兵抗命等种种手段破坏和平进程，反对领土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对于该群体中的一些极端分子而言，恐怖活动也是一种阻止和平进程的正当手段。20世纪九十年代奥斯陆和平进程导致定居点运动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在一系列阻止和平进程的活动失败后，该阵营的

^① 关于逊尼派（包括“基地”组织）是否存在类似于什叶派的马赫迪主义的完整的末世论，笔者屡屡请教国内外的相关专家和学者，他们大多持否定看法。但笔者认为，《哈马斯宪章》中明显包含了末世论的内容。

极端分子铤而走险，在 1994 年 2 月 25 日制造了希伯伦血案^①。接着，担心和平进程深化和希伯伦定居点被拆的信仰者集团与拉宾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并和谈的行动导致该集团的拉比委员会依据犹太教法将拉宾裁定为犹太人的“告密者”(moser)和“谋害者”(rodef)。据犹太教法，这两种最严重的罪行都是死罪，后者甚至不经宣判就可处死。^{[9]108}拉宾就成了“神圣拯救”进程的牺牲品。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基督教右翼已成为美国政坛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1999 年《新闻周刊》一项调查显示：40% 的美国人相信世界将会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在一场基督和敌基督的战斗中终结。^{[10]136}出于末世信仰，美国基督教右翼将保卫以色列、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尤其定居点运动）作为他们的神圣使命。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右翼已经成了美国国内强大的亲以势力，它和美国犹太人一起为以色列游说，严重影响了美国行政当局（尤其白宫）和国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决策，也构成美国公众亲以情绪的重要基础。最亲以的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福音派的支持。“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现在的以色列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关键前提”^[11]。

除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基督教右翼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几十个福音派亲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涌现，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运动、频繁发表亲以言论、向政府（如总统、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福音派重要人物不断发表热情洋溢的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如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称他“爱以色列”，认为耶路撒冷是“我的家”；“道德多数派”领袖杰里·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则称，“我与你们同行，不管你们需不需要……我伸出友谊之手，不求回报。”^[12]他们都将美国在末日的生存与美国保卫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基督教右翼还大力支持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犹太右翼极端势力在被占领土扩建定居点的活动，甚至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高度敏感的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2005 年，以色列沙龙政府弃卒保车的加沙单边撤离行动就受到信仰者集团和美国基督教右翼的强烈反对。沙龙中风后，美国基督教右翼很有影响的帕特·罗伯逊就称沙龙中风是因为他的单边撤离激怒上帝而受惩罚。

三、结语

宗教既可能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间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也可能成为制造裂痕和矛盾的温床。宗教往往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宗教影响全球社会政治的因素和方式多种多样，末世论仅是其中一种。末世论通常是推动人类自我超越和道德净化的动力，但对末世论的极端化认识则可能成为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裂痕和冲突的动因。

阿以冲突的历史根源错综复杂，其旷日持久、难见曙光也难以简单归责。自 20 世纪末以来，各自营垒中宣扬末世论的极端宗教群体成为巴以冲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冲突的性质已经从民族—宗教冲突转变成宗教—民族冲突。受“六日战争”影响，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带有强烈末世情结的群体较早兴起并在争夺巴勒斯坦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姿态，这刺激了相应的穆斯林群体的兴起和抗争。相较而言，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兴起并走上暴力冲突道路乃是一种晚近的现象，它们不仅加剧了各自社会的矛盾和分裂，也成了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受中东力量结构的影响，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激进群体可以选择暴力较少的手段来推进其“神圣拯救”进程，但这并

^① “信仰者集团”成员巴洛克·高斯坦(Baruch Goldstein)在当天清晨潜入希伯伦的一座清真寺，对正在祈祷的穆斯林疯狂扫射，当场打死 29 人，伤 100 多人。

不意味着它们无须为和平进程屡屡受挫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 [1] 王逸舟.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2] Barry Cooper. New Political Religions or An Analysis of Modern Terrorism [M].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 [3] Andrew G. Bostom. Apocalyptic Muslim Jew Hatred [N]. Front Page, 2006-07-18.
- [4] David Newman. The Impact of Gush Emunim [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Ltd, 1985.
- [5] Peter Gardella. Gentile Zionism[J]. Midstream, May 1991.
- [6] Yaacov Ariel. Philo-semites or Anti-semites? Evangelical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Jew, Juda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M]. Jerusalem: The 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2002.
- [7] Hamas Charter[R]. 1988.
- [8] 殷罡. 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问题[M]// 殷罡.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 [9] Ehud Sprinzak. Israel's Radical Right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Rabin Assassination [M]// Yoram Peri. The Assassination of Yitzhak Rabi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Madeleine Albright. The Mighty & the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 [11] Dana H. Allin, Steven Simon.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US Support for Israel [J]. Survival, 2003,45(3).
- [12] Herbert L. Solomon. The New Right and the Jews[J]. Midstream, December 1985.

Eschatology and Global Social-Political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WANG Shuming

Abstract Eschatologies, held by different groups of fundamentalism, have been elements of conflicts caused not only social-political rupture in many countries, but worsene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ic world and Western world. The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is such a model case. Eschatology is a very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the Gush Emunim of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Christian right to actively advancing the settlement movement in Palestine. Their aggressive actions gave much impact in the identity of Moslem, and, damaged the basic rights, dignity as well as salv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latter. It caused the rising and countpunching of Islamic counterparts.

Key Words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Eschatology; Social-Political Conflict; The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责任编辑: 孙德刚)

本期执行编辑: 钮 松